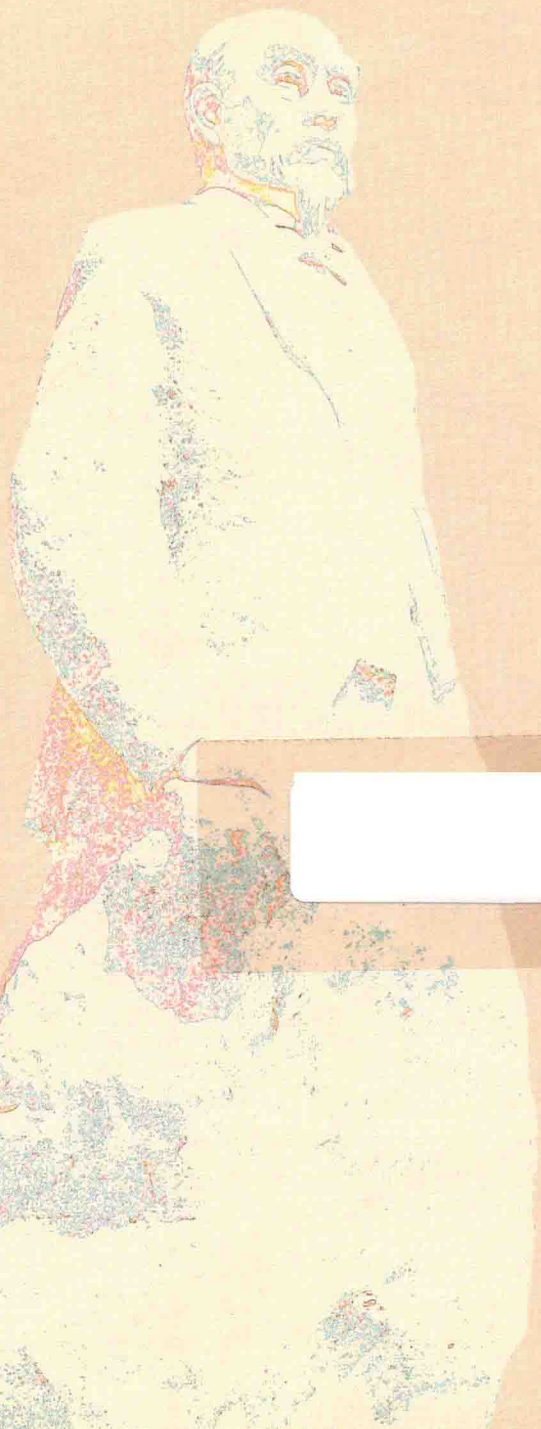


张謇研究中心 · 张謇著作选注系列



张謇 教育文论选注

沈行恬 编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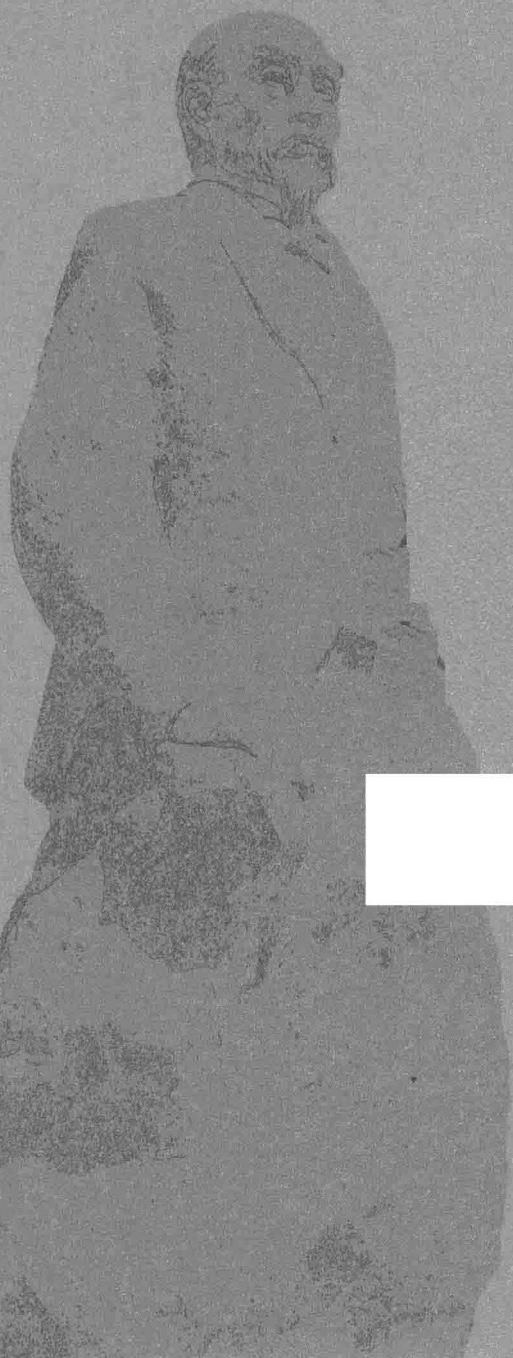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张謇研究中心 · 张謇著作选注系列



张謇教育文论选注

沈行恬 编注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謇教育文论选注 / 沈行恬编注. — 南京: 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651-2522-5

I. ①张… II. ①沈… III. ①张謇 (1853—1926) —
教育思想—文集 IV.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21177 号

-
- | | |
|------|---|
| 书 名 | 张謇教育文论选注 |
| 编 注 | 沈行恬 |
| 责任编辑 | 王欲祥 |
| 出版发行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
| 电 话 |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
| 网 址 | http://www.njnup.com |
| 电子信箱 | nspzbb@163.com |
| 照 排 |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
| 印 刷 |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 印 张 | 32.5 |
| 字 数 | 595 千 |
| 版 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51-2522-5 |
| 定 价 | 68.00 元 |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编注说明

一、本书主体内容分为“选录注解”与“存目导读”两部分。“选录注解”部分采用“文题+关键词+导读+原文+出处+注解”体例，“存目导读”部分只保留“文题+关键词+导读+出处”。

二、导读部分主要简介成文背景、提挈全文大意及主要观点，一般不作或少作评论，对节选文稿的删节缘由略加说明。

三、原文以《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版）为依据，文末括号内数字表示原文在《张謇全集》中的卷次和页码，如“(4—132)”表示“第 4 卷 132 页”。选文按撰写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月、日无考的列于同年之末，年无考的列于全书正文之末。选录时注意完整保留能够反映张謇思想观点的文章，专论尽量全文选录，合论则节选有关部分。

四、注解以实词为主，也选注少量虚词，部分难句尽量以直译或意译加说明的方式予以注解；原文中的重要引文注明出处，并适当扩充引述；一般语词前文中已经注解，后文中出现时不再加注，某些重要或难解语词以“参见《……》……”的方式扩充注解。

五、本书编有“关键词索引”和“人名索引”，以便于检索利用。

序 言

《张謇教育文论选注》问世，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沈行恬先生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在南通师范学校担负行政管理领导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此同时，他坚持研究学校创办人张謇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多年，颇有心得。今他对张謇撰写的有关论述进行编选、注释和精心整理，完成《张謇教育文论选注》一书，敬献给大家，也是他的一份心意。

我与行恬先生结识多年，他对张謇在《通州师范开校演说》中“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的寄语有较深刻的理解。他正是以这样的愿望与态度从事教育工作，也是以这样的愿望与态度研究学术的。相信《张謇教育文论选注》一书的出版，必将有益于年青一代了解和弘扬张謇先生为振兴中华而“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奋斗精神，也有益于学界对于张謇研究的拓进。

张謇式

张謇生平纪略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晚年自称啬翁，后人尊称为张季子、张南通、张四先生、啬公等。

张謇祖籍江南常熟，远祖张建元末迁至通州，其后裔世代务农。祖父张朝彦入赘金沙镇吴家，兼事农业和瓷器生意，后移居海门常乐镇。父亲张彭年继承祖业，勤劳精明，修仁好文，先后娶葛氏、金氏，育有五子。张謇排行第四，为金氏所生。

张謇从小聪颖，4岁时随父亲学千字文，5岁能一字不差背诵全文。初入私塾时，先生邱畏之为其取学名吴起元。11岁时，张謇念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蒙学基本书籍。父亲寄望甚重，课子甚严，令张謇兄弟下田劳动。另请西亭秀才宋蓬山来家中设馆授学，凡洒扫侍应，让张謇兄弟一体承担。至14岁，张謇又读完了《诗经》《礼记》《春秋全传》等，并能作诗制艺。可以说，此时张謇已系统接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基本训练。

清同治七年（1868），15岁的张謇开始进入科举考场。按当时科场规定，祖上三代没有学官或入学为生员者即为“冷籍”，其子弟无报考资格，应试须有同族中具备资格的人“认保”。经宋蓬山之子宋璞斋介绍，张謇认如皋人张驹为祖父，更名张育才，以如皋子弟身份参加县试、州试、院试。这一年年底，张謇考中秀才，但冒籍考试招来的麻烦也随之降临。原来张驹之弟张骐及其儿子张镛借机一再向张彭年大加勒索，并与当地学官串通要拘押张謇，张謇全家饱受敲诈、凌辱之苦，一个小康之家几年间几乎倾家荡产。他的遭遇得到了海门厅训导赵彭渊、师山书院山长王汝琪的深切同情。除接纳张謇入师山书院学习外，他们还多方斡旋求助。后来，趁江苏学政彭久余来通州主持院试的机会，张謇上书请求革除自己秀才资格，回籍通州应试。幸好彭久余与通州知州孙云锦等怜士惜才，调停援护，屡费周折，于同治十二年（1873）夏终经礼部批准，将张謇划归通州本籍。“冒籍风波”是社会给张謇上的人生一课，使他获得了世态炎凉、人心善恶的切身感受。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调任江宁发审局主管的孙云锦出于对张謇的赏识,邀张謇担任发审局书记(幕僚性质的私人助理)。孙云锦得知张謇乡试未中,家道艰难无力再学,对他照顾有加。因在江宁事务不多,且受到孙云锦鼓励,张謇先后投考钟山书院、惜阴书院,在两所书院院长李小湖、薛慰农和凤池书院院长张裕钊指点下,学习《史记》《汉书》《通鉴》《文选》以及唐代诗词文赋等,研究《易经》《诗经》《尚书》《周礼》等经典文献的注疏。江宁作为六朝古都、东南重镇的文化氛围也让张謇大开眼界,获益匪浅。读书研学之余,张謇随孙云锦前往淮安查勘,处理公务,得以较多地接触社会,了解民生,增强了他向学修身、济世恤民的思想意识。

这年冬天,张謇参加岁试后回海门探亲,娶本地徐氏之女徐端为妻。翌年初回江宁后,经孙云锦介绍,张謇结识了庆军统领吴长庆。年底,孙云锦奉调河运差,询问张謇愿否同往。张謇因父母嘱其参加明年乡试,不敢远行,遂辞谢恩师。

光绪二年(1876)闰五月,张謇应吴长庆之邀加入庆军幕府,开始了新一段重要的客幕生涯。吴长庆虽是武夫出身,却以儒将著称。他十分器重张謇,所给待遇也很优厚。张謇在办理文牍之余,仍可专心读书应考,其间也结识了一些挚友,互相切磋学问。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张謇具呈学官,改名张謇,字季直,正式抛弃了那个令他羞愤的名字。

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国边疆屡遭列强侵犯,危机四伏。光绪六年(1880)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军赴登州驻扎。光绪八年(1882)六月,朝鲜发生“壬午事变”,中国很快卷入其中。七月,应朝鲜国王请求,吴长庆率清军入朝,意在维护朝鲜统治秩序,防止日本势力扩张侵扰。八月,“壬午事变”得以平息,吴长庆居功甚伟。张謇作为吴长庆的重要助手,亦显示了卓越的胆识才干。然而,吴长庆返国后非但没有受奖,反而遭到把持朝政的李鸿章等人的排挤。张謇看出其中因缘,力劝吴长庆引退。不久,他自己也无奈地离开庆军回到家乡。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吴长庆抑郁而亡,张謇深感哀伤。庆军客幕八年,对张謇是极为难得的人生历练。他虽未能借此来建功立业,施展宏图,却有机会结交了更多的朝野名流,而且直接参与了有关国事的决策实行,这无疑对他日后的人生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多年参与政事,四方游走,使张謇耳闻目睹国家的凋敝、官场的叵测、民生的艰难。回到海门乡里的张謇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谋划、主持了多种地方建设活动。他大力倡导发展蚕桑事业,谋减花布捐税,主张设立赈灾平糶义仓,并建议官府抚恤受灾户,研究农业技术,争取为海门增

设拔贡生额……总之，张謇在乡十年始终奋勉作为，他日后倡导“村落主义”，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已初现端倪。

其间，张謇也间或短期外出做事、应考。虽然张謇考运欠佳，乡试连续失利，但因其学识有目共睹，遂在士林逐渐赢得一定声望。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张謇往任幕僚。这年夏天，黄河决堤，洪水泛滥，人畜死伤无数，灾民四散奔逃。张謇心急如焚，含泪告请设局赈灾。河南巡抚倪文蔚接受孙云锦推荐，命张謇规划治理黄河工程。张謇用心钻研，提出疏塞并举、恢复禹道的治黄方针，与外国工程师勘测后的主张基本一致。但是这种根治方案在当时无法实现，连退而求其次的切滩取直方案也未被接受，张謇只得辞职返乡。不过这几个月的治水经历和对水利史书的研究，为他以后治淮作了实践和理论的铺垫。

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参加顺天乡试获中“南元”（南方举子第一名），其后一些书院纷纷邀请他主持。光绪十四年（1888），张謇应赣榆知县邀请主持选青书院，这是张謇首度从事教育担任教职。光绪十九年（1893），又应崇明知县之邀主持瀛洲书院，并得到两名得意弟子江谦、江导岷，他们后来成为张謇兴办事业的骨干。在此期间，张謇对古代经典进行学术研究，写成《周易音训句读》上、下卷，《周易》的变化观念与中庸思想对张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光绪二十年（1894）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举行恩科会试。自中“南元”后，因连考连挫，张謇已对科举之途心生厌倦。然而，他难违父命，不得不勉强再次踏上进京赶考之途。三月初八开始头场考试，张謇连考试用具都是杂借友人的，试毕也不想打听放榜消息，结果居然中了第六十名贡士。接下来的复试又取得第十名。四月二十二日参加殿试，二十四日在乾清宫门外听宣，以一甲第一名被引见，中了状元。可是此时已过不惑之年的张謇内心难有大魁天下的兴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次日，张謇被授翰林院修撰，官阶从六品，算是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了。

张謇最终科举夺魁，除去本人才学不论，实乃朝廷清流人士长期扶掖的结果。清流派首领翁同龢曾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且曾为同治、光绪帝师，他标榜风节，以经世匡时为己任，又扶持后进，对张謇这样才华出众、思想同道的后学自然乐意网罗。因而，充满爱国报国之心的新科状元张謇初涉政坛，就不可避免地归其行列，且很快卷入了政治漩涡。

当其时，列强对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分各有所图。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国

势逐渐强盛，早就觊觎朝鲜和中国的利益，中日之战已露端倪。对此，朝廷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张謇的立场一向是“以战求和”。光绪六年（1880），他就在《代吴长庆拟陈中俄战和两策疏》中写道：“伏念自来中外交哄，不过战和两策。和取目前无事，而战为全局之通筹。以和为和，是罢战之论发于我，而彼强我弱；以战为和，使愿和之请出于彼，则彼绌我伸。此在稍识时务者，即能辨之。”此后又在《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指出：“臣尤伏愿皇上时时有必战之心，事事图能战之实，自然有可和之时机，无轻和之后悔。是以战为和者，千古中外不易之长策也。”于是，张謇与主战派代表人物翁同龢接触频繁，他凭仗对朝日形势的熟悉，积极献策。而朝野间对主和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多有不满，联衔上书弹劾要求惩办者不少，张謇则单独上了一道《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斥责李鸿章庸劣误国，主张“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张謇的奏疏言辞激烈，切中要害，表现出他反抗外侮、维护国家主权的强烈爱国情怀。

就在甲午战事日益紧张之际，九月十八日，张謇得到父亲去世急电，只得匆匆告假，离职回籍，循例守制。回到故里暂别了政坛纷争，但张謇忧国恤民的情怀没有改变，特别是由于对内政腐败、外交屈辱有了沉痛的感受，加上幼年就得到注重农商的家教熏染、求学时接受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以及对中国何以落后西方国家等问题的思考，他萌发了投身实业、筹办教育的新的人生追求。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对张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重要人物，长期官居高位，他开矿设厂，兴办洋务，其时刚刚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早在张謇客幕吴长庆帐下时，就对他十分看重，吴长庆去世后，曾想聘张謇入幕。张謇当时以“南不拜张（之洞），北不拜李（鸿章）”自诩，但对张之洞的礼遇还是心存感激的。张之洞奏请朝廷委任张謇总办通海团练，后又委托他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张謇以新科状元身份，上得到东南大吏信任，下取得地方各界拥戴，乘势而为，担当重任，为后来创办实业、普及教育作了必要的前期准备。不过真要迈出状元下海这一步并非易事。张謇晚年在《自订年谱》中曾对当时的内心活动有过描述：“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闇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踟蹰累日，应焉。”

花供应充足这一点，把创办纱厂作为创办实业的第一步。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选择在唐家闸筹办纱厂，根据《周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为纱厂取名“大生”。几年之后，大生纱厂有了良好的回报。张謇又趁着发展势头，积极招股在崇明外沙久隆建立大生分厂，并从棉纺织业逐步扩展到其他行业。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张謇丁忧期满，进京至翰林院销假。这时，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掀起，并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维新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正进入高潮。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随后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出台了一系列维新法令。张謇认可变法维新的政治取向，也受邀列名于维新组织强学会，并受翁同龢的委托拟写《京师大学堂办法》，间接参与了一些变法活动。但是，凭着对清朝宫廷政局的洞悉，他对康、梁变法的激进做法却不尽赞同，一再劝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果然，深怕被动摇执政基础的慈禧太后不久突然采取强力手段，软禁了光绪帝，将支持变法的朝廷重臣翁同龢开缺回籍，大肆捕杀迫害维新人士。张謇为避免卷入更深的政治漩涡，便以急于继续筹办通州纱厂为由，再度向翰林院告假，匆匆离京返乡。

光绪二十六年（1900），标榜“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席卷全国，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与侨民为由，组织“八国联军”经天津直犯北京。张謇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联保”。五月三十日，由东南地区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协商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在中国社会面临全面混乱、列强干预日盛、清政府陷入危机的形势下，此举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政府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重创后，深感仍按祖宗成法已无法继续维护统治，于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诏令朝臣条陈变法意见。张謇在家乡密切关注着国家政局与京城事变，便应刘坤一召请，与好友反复商议，斟酌修改，写成了洋洋两万余字的《变法平议》。刘坤一、张之洞联合上奏的著名的“江楚三折”，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就吸纳了张謇在《变法平议》中的部分意见。《变法平议》堪称张謇理想中的关于社会全面改革的总体方案，初步显示出张謇的立宪意识，其中普兴学校、发展教育被放在了突出位置。从清廷推行新政的实际情况看，张謇对其决心与力度不免失望，但他并未气馁，决计以自己的方式为推进改革而继续努力：一方面积极投身立宪运动，另一方面勉力实行地方自治。

光绪二十六、二十七年（1900、1901），通海垦牧公司和同仁泰盐业公司在黄海之滨相继成立，张謇开始围海造田发展植棉业，利用滩涂经营改良盐业。此后，进而涉足其他工业、交通业、通讯业等领域，通海地区初步形成一个因地制宜、衔接协调、惠及民生的近代产业体系。在大力兴办实业的同时，张謇把发展教育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张謇认为普及教育必须以小学为根基，而要办好小学，起点则是办好新式师范教育。他在呼吁官府无效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自己募集资金，在家乡南通创办了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通州师范学校的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件开风气之先的大事，中国人自己举办的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等师范学校由此诞生。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至六月间，张謇应邀前往大阪，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并在日本各地进行了近70天的考察。其间走访了20座城市、30家农工商企业、35所各类学校。在考察中，他坚持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留下了内容翔实的《东游日记》。这次东瀛之行，让张謇亲眼看到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与“百日维新”后依旧沉沦的中国之间的强烈反差，从而痛切地感悟到：中国要兴盛强大，必须效法日本，从政治制度、精神文化到实业教育进行全面革新。事实上，日本的经验在日后张謇主张立宪政治以及兴办实业、教育的实践中，通过他的消化吸收，择取发挥，得到了切实的体现。

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倡议设立“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负责在通州、泰兴、如皋、静海、海门筹办小学和中学。他提出按区域分年度普及小学教育的规划，并提议设立通海五属中学。由于在教育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威望，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张謇当选为江苏学务总会（后更名为江苏教育总会、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总会成立后，开展了编辑教材、培训教师、交流教育经验、讨论教育改革等不少工作，为发展江苏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张謇的亲倡力行，到1925年，通海地区已建有小学、中学370余所，高等学校、师范学校、职业学校10多所，幼儿教育、特殊教育、通俗教育也蓬勃兴起，教育普及程度令世人瞩目。

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立宪思潮已在社会精英群体中得到广泛传布和高度认同。张謇从撰写《变法平议》到前往日本考察，越来越认识到宪政的必要。他热心宣传立宪知识，编辑出版《日本宪政义解》《日本议会史》等书籍，与志同道合者商讨立宪事宜，并为张之洞等大臣起草立宪奏稿，还主动捐弃前嫌争取袁世凯对立宪的支持。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谕旨。同年十一月，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张謇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宣统

元年（1909）八月，江苏咨议局成立，张謇又担任了议长。其后由江苏咨议局首倡，各省咨议局联合推举代表进京，发起以设立责任内阁和早开国会为号召的国会请愿运动，张謇的倡议领导之功得到举世公认。

以三次进京三次上书的国会请愿为高潮的立宪运动，终因不能见容于清朝当局而宣告失败。在此期间，激进的革命主张潮流涌动，形势发展迅速。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3岁的溥仪继位，他的父亲载沣摄政，定明年为宣统元年。张謇本着传统的君臣观念，对新政权诚恳劝言，指出“外交有三大危险期，内政有三大重要事”，希望政府能深思而善处之。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10.10），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此时张謇正在武汉，他是为主持大维纱厂的开业仪式以及大维公司的人事安排前往武汉的，这是张謇将大生资本集团的经济势力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的一次努力。次日，汉阳、汉口的新军相继起义。再次日，武汉三镇宣告光复。张謇目睹了武昌起义的发生，他登船东归，一路上都感受着革命浪潮的蔓延。到了南京、苏州、上海等地，他与地方官员频繁磋商，力图敦促清廷速行立宪，以稳定时局。然而，全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超出张謇的预料。随着各省纷纷宣告独立，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和平光复，不仅使张謇对动乱的恐惧有所消弭，而且给了他新的启迪：既然革命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毋宁纳全族于共和主义之中”。于是他毅然放弃了曾经竭力倡导的立宪主张，转而赞同和拥护民主共和，完成了他生命历程和政治生涯中的根本性转折。他坚拒清廷委以高官厚禄的拉拢，发表了《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奉劝各地军政要员勿与革命军为敌，呼吁尚在彷徨的立宪党人支持共和，并且多次致电握有军政实权的袁世凯，希望他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转向共和，救民于两千余年专制统治的水火之中。不久张謇还亲自领导策划了家乡通州脱离清政府的和平独立行动。历史证明，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立宪党人及时转向共和，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覆灭和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建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张謇受任实业部总长。为缓解临时政府严峻的财政危机，张謇奔波于南京、上海间，不惜以个人信誉与大生纱厂资产作为担保，向外商借贷，共筹得50万元，替临时政府解决了不少困难。张謇还接受了两淮盐政总理的任命，准备对弊端丛生，影响政府财政收入的盐务进行改革。不久虽因政见不合，张謇辞去上述职务，但他仍以在野人士的身份，为协调共和初期的南北矛盾做了许多工作。

1912年3月10日，拥有军政实力且精于权术的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第二年10月21日，张謇出任民国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就职之初，张謇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列举了发展实业必须要落实法律、金融、税则、奖励等四方面的配套措施，并将经济领域的法制建设作为“第一计划”，主持制订、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划，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保障和推动作用。不过，张謇的一腔爱国热忱和振兴实业的理想遭遇到“财政蹶蹶，无可措手”的严酷现实，内心相当郁闷。更令他失望与不满的是，自己曾寄予厚望的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本质日益暴露。张謇深知大局难以挽回，不久便以“勘视淮灾”为名请假离京，后正式请辞农商总长一职，未获袁世凯批准。第二年4月张謇再次请辞，方才获准。到这年年底，张謇连全国水利局总裁之职也不再担任，彻底摆脱了与袁氏政权的纠葛，从此专心于“村落主义”，以南通为基地尽心竭力地实践地方自治事业。

张謇很早就有经营乡里、造福乡里的“村落主义”抱负，即使活跃于全国政治舞台时也未曾须臾放弃。在张謇心目中，南通的地方自治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将南通建成一个“新世界雏形”。

对于南通地方自治，张謇有着长期的思考、周到的规划和既定的步骤。他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他将“父教育而母实业”作为自治强国的根柢，“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自大生纱厂创办以来，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体系在南通日渐配套健全，规模不断扩大。广生榨油公司、大兴面粉公司、泽生水利公司、通燧火柴公司、资生铁厂、颐生酒厂等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核心企业大生资本集团则在1912年至1921年十年间，资本与利润大幅增加，为扩大实业规模与发展教育、慈善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农垦、盐垦也有了长足发展，农工一体的经营思路进一步得以确定与实施，绵延600多里的苏北沿海滩涂地区，先后办起数十家农垦、盐垦公司。作为现代经济与社会重要构成的金融、交通、电气、通讯、贸易、服务等行业都蓬勃而起。淮海实业银行、大达轮步公司、通明电气公司、大聪电话公司、新通贸易公司等相继成立，专事对外贸易的南通绣品公司还在美国纽约开设了办事处，有斐馆、桃之华馆、南通俱乐部等旅馆也逐个开业，还建成了东南西北中五公园，以及唐闸公园等多处场所供居民娱乐休憩。城市布局与市政设施方面，中心城市南通“一城三镇”的格局已经架构起来，以城区为核心，分布于周边六公里左右的唐闸镇、天生港镇、狼山镇共同组成的整体城市格局，在空间上相对隔开、错落有致，在功能上合理分工、各有侧重。此外还修建了连通县城内外的公路干线、支

线、码头、桥梁。因而，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指出，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还有外国人士称赞南通是当时“理想的文化城市”、“耐人寻味的典型”。

如同注重实业的整体效应一样，张謇一向秉持“实业教育迭相为用”、“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的理念，十分重视教育与实业的关联性和教育自身的系统性，南通的教育事业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展完备，基本形成了纵向上层次由低到高、横向上门类较为完整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地方教育体系。他在通州师范附设了农科、测绘、蚕桑、工科等实用学科，在中学附设培养文秘人才的国文专修科，又陆续在南通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法政学校、纺织学校、医学专门学校、银行专修学校、盲哑学校，以及幼稚园、育婴堂等，还向政府呈文建议设立工科大学，筹办南洋大学，并且在南通以外的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创办或协助创办复旦学院、中国公学、水产学校、商船学校、铁路学校、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学校，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此外，他注重社会教育，在南通创办了具有教育功能的各种文化机构、设施，例如翰墨林印书局、博物苑、图书馆、更俗剧场、公共体育场、军山气象台，还经常举办展览会、讲习所等作为辅助学校教育、促进民智开化的途径。张謇大力推行地方自治的实践，为南通迈向新型的现代化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謇晚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势力卷土重来，北洋军阀割据连年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以及企事业自身规模扩展过快、投资方向决策失误等原因，张謇勉力创办、苦心经营的南通地方自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1921年，通海地区遭到特大台风暴雨的袭击，外江内河同时泛滥成灾，张謇打造多年的农垦、盐垦设施几乎毁于一旦。1922年，大生企业系统出现严重亏损，大生一厂、二厂负债额分别高达1242万两和352万两。面对来势凶猛的困境，张謇殚精竭虑，努力撑持，顽强应对。他希望通过改进决策管理、严格财务监督、引进国外资本等途径渡过难关，重振事业。但颓势终究未能挽回，艰危仍在日益加剧。1925年，大生资本集团不得不清盘偿债，由债权方江浙银团接管。

呕心沥血奋斗三十年竟然如此结局，张謇心境之悲凉可想而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皤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虽三十年前，反复审虑，投身实业、教育二途，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而幸而利，幸而成，又展转而至于钝，几于败，亦可已矣。而苦不能已，则以教育根本未完，实业替人未得，尚不可为陋巷箪瓢之颜子，即不得不仍为胼手胝足之禹稷也。”

这样的一种心忧天下、矢志不渝的心迹真是感人肺腑！

张謇是一个抱负远大、业绩卓著的人，也是一个兴趣丰富、情感质朴的人。他一生喜好吟诗作赋，其书法造诣堪称大家；他对戏曲情有独钟，曾三次邀请京剧名家梅兰芳来南通演出；他倾注了很大热情于刺绣艺术，聘请江南高手沈寿女士主持女工传习所，促成“沈绣”艺术走向高峰，还亲自记录整理了《雪宦绣谱》。作为生活在旧时代且地位声望显赫的状元公，张謇娶有一妻四妾，与发妻徐氏恩爱始终，家庭上下和睦相处。他与叔兄张謇手足情深，成为默契的事业搭档。对儿子张孝若，他慈严相兼，寄予厚望，委以重任。张謇本人一生恪守儒德，律己甚严，生活俭朴，鞠躬尽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依旧不辞劳顿地奔波操持。1926年8月1日，已患病发热的张謇仍冒着酷暑前往视察沿江保坍工程，回家后病情越来越重，虽经名医抢救，终于医治无效，于24日中午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周岁。

坚苦自立 忠实不欺

——张謇教育人格论纲

张謇是一位为了救亡强国而奋然投身政治、兴办实业、从事教育、改造社会的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教育是他毕生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育家的张謇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张謇所处的晚清民初时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文化交相激荡的时期。自19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列强侵入，西学东渐，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逐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图存、更生图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成为志士仁人的强烈愿望。在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变化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的性质与走向也在发生深刻的嬗变革新。在兴教育以启民智、启民智以强国力的共同认识与自觉追求下，人们在思考、在探索，各种教育思潮此呼彼应，各种新式教育次第出现。张謇是这一时代转型、教育变革的亲历者、助推人，是一位持大教育观，办大教育事业，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产生了大影响的大教育家。

张謇有着独特而可贵的教育人格，研究张謇教育文化，应当重视对于张謇教育人格的研究，以期对探索、推进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张謇在数十年勇毅而艰辛的办学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认真阅读张謇本人的论说、讲演、文函、日记等，是我们认识张謇教育人格的必经之路。

清光绪三十年（1904），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张謇为他亲创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题写了“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并在跋语中揭示：“以是二语勸勉诸生，亦即生平强勉自厉之所在也。”印证于张謇的整个教育人生，我们也可以说：坚苦自立，忠实不欺，是张謇教育人格的写照。对此，我们试从三个方面加以解读。

一、深挚而坚忍的教育情志

张謇出身于兼事农商、尚学修仁的家庭，幼时受教于私塾，稍长又求学于书院，很早就熟读儒学经典，饱受修身济世的传统文化的浸染，对学习、教育有着深刻的理性认知与真切的情绪体验。他曾一心想应试登仕，求取功名利禄，然而多年的科举应试，一方面使他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他认识到科举制度对于多数学子士人的戕害，以及它在西学东渐、社会转型形势下的不适应。从客幕孙、吴，参与政务军事，到官授翰林，踏入朝廷高层，直至投身立宪，兴办实业与教育，经营地方自治的人生经历中，张謇目睹民生艰难、灾患凶险，尤其是痛感于战败之辱、国势之蹙，办学兴教的抱负逐渐形成并日益坚定，他投入于教育的情感也越发充沛。“父教育而母实业”是他救亡图强、复兴中国的一句名言，将教育比喻为孕育强盛国家的父体，这既是对教育重大意义的生动表述，也不难于此看出他对教育的一种特殊情意。

张謇从教之始是主持书院工作。光绪十三年（1887）十二月，张謇接到赣榆知县聘请他主持选青书院的邀约，次日便欣然复函应邀。对赴任、课期、阅卷等，他在日记、自订年谱以及致友人的信函中皆有所记述。其后关于受邀主持太仓娄江书院、崇明瀛洲书院之事也都记载于日记、自订年谱之中，可见青年时代的张謇就十分看重自己从事教育的经历。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已身为恩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之职，但应张之洞之邀接掌江宁金陵文正书院后，他更是倾注心力，勤勉为之。虽然那时他先是因父亲亡故守制在籍，后又规避戊戌政治风险告假返乡，操劳于经营地方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但在长达六年的任职时间里，仍不辞劳顿时常奔波于宁通之间，授课、阅卷等极为负责。光绪二十三年（1899）七月十七日日记中有“校课阅一百五十本，生平校阅之苦无过于此”之语，其工作之认真可见一斑。在此期间，他拟定《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章程》，编辑文正书院丙庚课艺录并作序文，对书院教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革新。

设立通州师范学校是开中国近代教育风气之先的创举。张謇先是竭力申请官立，怎奈遭到守旧官员阻挠讥讽，说什么“中国其他事不如人，何至于连读书也要向人家讨求方法？”这使刘坤一心生犹豫，举棋不定。张謇认准办师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计再苦再难也要及早办起来，于是毅然自立创办，以自己开办大生纱厂数年未支的酬金以及地方热心教育的有识人士集募的有限资金，亲自选址、规划、督造而成，并且亲自担任总理（校长），亲自制定章程，亲自延聘教习，亲自安排招生。其中的艰难曲折，我们可从张謇的几则日记中